

## 東漢大思想家王符之研究（一）

韓復智

### 一、前言

兩漢是經學的全盛時代。當時許多大儒講經的目的，在「通經致用」，換言之，即是要經學在當時能發生作用。如王符說：「索物於夜室者，莫良於火；索道於當世者，莫良於典。典者，經也。」<sup>1</sup> 因為他們鑒於漢興以來，社會經濟的貧富懸殊，是刑不輕、姦不改、風化不美、政令不行的根源，為當時政治上最大的問題。所以，他們希望以學術文化來領導政治，以政治控制經濟，而消除當時強凌弱、富奪貧、智欺愚的不平之慘狀，達到移風易俗，使人民安樂的目的。因此，他們對政治都特別關心，在他們的著作中，論政都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。<sup>2</sup> 例如賈誼、董仲舒、王吉、貢禹、揚雄、桓譚、王充、<sup>3</sup> 王符、崔實、荀悅與仲長統等都是這類儒者的代表人物。他們在大一統的君主專制政體下，在豪族盛氣凌人的環境中，為了人民的福祉，和社會的安寧，或痛心疾首的犯顏直諫，或隱居著述，以抒己見，完全將個人的生死榮辱富貴貧賤置於度外。這種悲天憫人的胸懷，是很值得我們欽佩的。

一個人的氣質，學問的傳承和功力的大小，生平的遭遇，以及他所處的時代，往往是決定這個人思想的形成的要素。但是，這些要素，對每一位思想家的影響力，不但不盡相同，而且又互相影響。氣質可以影響一個人治學的方向；而學問也可變化一個人的氣質。生活在同一時代，雖然受到同樣的遭遇，因為氣質和學問功力的不同，各人的感受和反應也不一樣。相反的，時代和遭遇，對於一個人的氣質的薰陶，與學問的取向，同樣可以產生很大影響。<sup>4</sup> 由此可知，王符、張衡和崔實等，雖處於同一個時代，因為他們的氣質和生平遭遇等的不同，所以，他們對當時稅政的反應也不一樣。我們認為在東漢諸儒中，性格最特殊，對時弊最敢冒生命危險大膽指陳的，首推王符。他批評的問題不但最廣泛，最富代表性，同時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。這是我們研究東漢史，尤其中

<sup>1</sup> 王符，潛夫論卷一讀學第一（四部備要本），頁五。

<sup>2</sup> 參看錢穆，秦漢史第五章第四節（臺北，三民書局總經銷），頁二〇九～二二七。

另參看徐復觀，兩漢思想史王充論考（民國六十五年六月，臺北，學生書局印行），頁五六三。

<sup>3</sup> 參考徐著兩漢思想史賈誼思想的再發現、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、揚雄論究、王充論考，頁一〇九～六三七。

參看馮芝生，中國哲學史第二篇第四章，頁五七四～六〇一。

參看胡適，中國中古思想小史第六、七講（民國五十八年四月，臺北，胡適紀念館出版），頁五三～六九。

<sup>4</sup> 參看徐著兩漢思想史，頁五六三。

葉以後的歷史，不得不研究他的原因。

## 二、王符的生平、著作及其思想領域

### (1) 生卒年

王符字節信，安定臨涇（今甘肅鎮原縣西）人，生卒年無法確考。據後漢書卷四十九本傳說：「與馬融、竇章、張衡、崔瑗（崔實之父）等友善」，並和皇甫規往來。<sup>5</sup> 馬融生於章帝建初四年（西元七九年），卒於桓帝延熹九年（一六六），享年八十八。<sup>6</sup> 竇章約生於章、和之際，卒於順帝建康元年（一四四）。<sup>7</sup> 張衡生於章帝建初三年（七八），卒於順帝永和四年（一三九），年六十二。<sup>8</sup> 崔瑗生於建初三年，卒於順帝漢安二年，年六十六。<sup>9</sup> 皇甫規生於和帝永元十六年（一〇四），卒於靈帝熹平三年（一七四），享年七十一。<sup>10</sup> 由此推知，王氏的生年似不致早於馬融，卒年也不會晚於皇甫規，大約生在和、安之際，卒於桓、靈之際。所以有人認為他約死於一七〇年，<sup>11</sup> 即靈帝建寧三年。

### (2) 性格及友人

安定俗鄙庶孽，王符因無外家，故為鄉人所賤；然符少好學，有志操，<sup>12</sup> 「精研經術，而達於當世之務」<sup>13</sup>。但由於他那反流俗與獨立思考的性格，使他終生隱居不仕，以君子賢人自居，對廣大的民衆十分同情。

他一生所交的朋友，已如上述，今將他們的生平簡介如下：

馬融，「才高博洽，為世通儒」，<sup>14</sup> 為一標準的古文經學家。然「達生任性，不拘儒者之節。居宇器服，多存侈飾。」<sup>15</sup> 桓帝時，為南郡太守，後拜議郎，以病去官。「初，融懲於鄧氏，不敢復忤勢家，遂為梁冀草奏李固，又作大將軍西第頌，以此為正

<sup>5</sup> 後漢書卷四十九王符傳（民國六十一年九月，臺北，世界書局印行，新校後漢書注），頁一六三〇～一六四三。

<sup>6</sup> 同書卷六十上馬融傳，頁一九五三～一九七二。

<sup>7</sup> 同書卷二十三竇章傳，頁八二一～八二二。本傳云：「順帝初，章女年十二」，據此推知，章的年齡不會比馬融、張衡二人大。

<sup>8</sup> 同書卷五十九張衡傳，頁一九三九。

<sup>9</sup> 同書卷五十二崔瑗傳，頁一七二四，由傳中所載，可推知瑗約死於此年，上推約生於章帝建初初年。

<sup>10</sup> 同書卷六十五皇甫規傳，頁二一三七。

<sup>11</sup> 見胡著，中國中古思想小史，頁六二。

<sup>12</sup> 同註五，頁一六三〇。

<sup>13</sup> 潛夫論，汪繼培序，頁一。

<sup>14</sup> 同註六，頁一九七二。

<sup>15</sup> 同上。

直所差。」<sup>16</sup>

竇章，「少好學，有文學」，<sup>17</sup>後官拜屯騎校尉，頗「謙虛下士，收進時輩，甚得名譽」。<sup>18</sup>順帝漢安二年（二四二）官至大鴻臚。

張衡，「少善屬文，通五經，貫六藝。雖才高於世，而無驕尚之情。常從容淡靜，不好交接俗人。善機巧，尤致思於天文、陰陽、曆筭。」<sup>19</sup>安帝時，作渾天儀，著靈憲、弄丸論，後復造候風地動儀等。他不但是我國的第一位大科學家，卽在世界科學史上也有不朽的地位。此外，他又是一位歷史學家，文學家，和傑出的思想家。他爲官疾惡如讎，不避豪強，屢上疏斥讖緯，與時政之失。永和三年（一三八），官拜尚書。他的人生觀是「不患位之不尊，而患德之不崇；不恥祿之不夥，而恥智之不博。是故藝可學，而行可力也。」「願竭力以守義兮，雖貧窮而不改。」<sup>20</sup>

崔瑗，銳志好學，明天官，歷數、京房易傳、六日七分。請儒宗之。做汲令時，「爲人開稻田數百頃，百姓歌之。漢安初，爲濟北相。瑗愛士，好賓客，盛脩肴膳，單極滋味，不問餘產。居常蔬食菜羹而已。家無擔石儲，當世清之。」<sup>21</sup>

皇甫規，爲撫羌名將，得羌人愛戴。後因得罪了宦官和豪族，以至被「坐繫廷尉，論輸左校」。<sup>22</sup>後爲弘農太守，封侯不受。熹平三年（一七四），再轉爲護羌校尉，未至而卒。

由上面看來，可知王符的友人大都是宿德大儒，居官也多廉正愛民。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」，從他們的爲人處世的態度，也可推知符的爲人了。王符於晚年，曾往訪解官歸鄉（安定）的名將皇甫規，極得規的款誠接納。本傳說：

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，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，亦去職還家，書刺謁規。規臥不迎，既入而問：「卿前在郡食雁美乎？」有頃，又白王符在門。規素聞符名，乃驚遽而起，衣不及帶，屣履出迎，援符手而還，與同坐，極歡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「徒見二千石，不如一縫掖」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。符竟不仕，終於家。

### (3) 著作——潛夫論

王符甘願處貧賤，致力著述的原因，據范曄說：「自和、安之後，世務游宦，當塗

<sup>16</sup> 同上。

<sup>17</sup> 同註七，頁八二一。

<sup>18</sup> 同註七，頁八二二。

<sup>19</sup> 同註八，頁一八九七。

<sup>20</sup> 同註八，頁一九〇一、一九一六。

<sup>21</sup> 同註九，頁一七二四。

<sup>22</sup> 同註十，頁二一三五。

者更相薦引，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，以此遂不得升進。志意蘊憤，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，以譏當時失得，不願章顯其名，故號曰潛夫論。」<sup>23</sup>

王氏本人在該書的敘錄中自述道：

夫生於當世，貴能成大功。太上有立德，其下有立言。闕茸而不才，先（无）器能當官，未嘗服斯役，無所效其助，中心時有感，援筆紀數文字，以綴愚情，財令不忽忘。芻蕘雖微陋，先聖亦咨詢，……敘……三十六篇，以繼前訓……。<sup>24</sup>

為潛夫論作箋的清人汪繼培，在序文中也說明了王氏著述的用心：

謹案王氏精習經術，而達於當世之務。其言用人行政諸大端，皆按切時勢，令今可行，不為卓絕詭激之論。……然符以邊隅一縫掖，閔俗陵替，發憤增歎，未能涉大廷與論議，以感動人主；又不得典司治民，以效其能；獨蓄大道，托之空言，斯賈生所為太息，次公以之略觀者已。

在古代，入仕不但是讀書人惟一的出路，也認為是最尊榮的事。它不僅能揚名聲，顯父母，光於前，裕於後，又可發展抱負，實現理想，而造福人羣。若不得已退居教授，或著書立說，仍然希望他的生徒和讀者，將來把他的抱負和理想，展布在實際政治上。從上面看來，王符當然也很想從事政治事業，藉以發展抱負，造福人羣，但理想與現實是矛盾的。明君賢臣是他的政治理想，然實際政治還是被一些「俗人」所把持。他那天生反對流俗的性格，自然使他無法入仕。誠如他在書中本政篇說：

今世得位之徒，……而欲使志義之士，匍匐曲躬以事已，毀顏諂諛以求親，然後乃保持之，則貞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，豈有肯踐其闕，而交其人者哉！

因此，他在論榮篇中強調說：

論士苟定於志行，勿以遭命，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，無所用不足以為輕，處隸圉不足以為恥，撫四海不足以為榮。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哉！故曰寵位不足以尊我，而卑賤不足以卑己。

在交際篇中，他指出人各有志，不能以富貴貧賤衡量一個人品德的高低，富貴的人不可驕貧賤。

富貴未必可重，貧賤未必可輕。人心不同好，度量相萬億，許由讓其帝位，俗人有爭縣職；孟軻辭祿萬鍾，小夫貪於升食……伯夷採薇而不恨，巢父木棲而自願。由斯觀諸士之志量，固難測度。凡百君子，未可以富貴驕貧賤，謂貧賤之必我屈也。

<sup>23</sup> 同註五，頁一六三〇。

<sup>24</sup> 潛夫論卷十敘錄第三十六，頁一。

其次，他認為「財賄不多，衣食不贍，聲色不妙，威勢不行」，並非君子所憂愁的而「行善不多，申道不明，節志不立，德義不彰」，才是君子感到羞恥的事。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則見；無道則隱。」因此，在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長的情況下，他只有隱居著述，以張己說，希望透過文字，達到他革新政治，嘉惠百姓的願望了。

有人說，古代寫作，除著作、編述外，還有不少由鈔纂而成的書籍。這類書籍，古人但稱為「論」。「論」的本字，應該是「侖」。造字時，A冊為「侖」，（A，是集合的集子。）便是排比資料、纂輯成編的意思。漢書藝文志解釋論語一書得名的由來道：「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論語。」

比王符稍早的大思想家王充，雖是一位雄才善辨、自命不凡的人物。但是談到寫作，他却不敢以「作者」、「述者」自居。當論衡初寫成時，有人稱頌它可以算得了不起的大著作了。王充自己便說：「非『作』也，亦非『述』也，『論』也。『論』者，『述』之次也。五經之興，可謂『作』矣；太史公書，可謂『述』矣。」

這段話，記載在論衡對作篇。說明了天地間三種寫作的不同價值。凡係創造性的寫作，像幾部大經典，才够得上稱「作」。其次便是「述」；又其次便是「論」。王充竟把自己的論衡，歸到第三類。可知漢代學者，不獨不輕易拿一「作」字許人，也不輕以自許。連他們對「述」的標準，要求也是很高的。<sup>25</sup>

王符既稱他的著作為潛夫論，這不但表現出與王充有同樣的風範，在言論中更進一步發展了王充的批評精神。

范曄以潛夫論「指訐時短，討譏物情，足以觀見當時風政。」<sup>26</sup> 因於王符傳中，收錄了五篇（貴忠篇、浮侈篇、實貢篇、愛日篇和述赦篇。）但傳中所錄，與潛夫論對照，則詳略不同，以貴忠篇為例，則傳略書詳。

王符一生所著之潛夫論，共十卷，隋書經籍志與舊唐書經籍志均有著錄。<sup>26</sup> 四部備要本（中華書局據湖海樓陳氏校刊），全書十卷，連敘錄共三十六篇，有箋。汪繼培述其作箋的動機說：

王符潛夫論，行於今者，有明程榮本、何鏗本，何出於程，不為異同。別有舊本，與白虎通德論、風俗通義合刻；風俗通義卷首題云，大德新刊。三書出於同時，蓋元刻也。元刻文字，視程本為勝，邊議、巫列、相列、夢列、釋難諸篇，簡編脫亂，不如程本，其務本、過利、慎微、交際、明忠、本訓、德化、志氏姓諸篇，

<sup>25</sup> 地平線出版社編，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第三編第二章（六十一年十二月，臺北，地平線出版社印行），頁二〇〇～二〇一。

<sup>26</sup> 隋書卷三十四經籍志（臺北，史學出版社印行，新校廿五史本），頁九九八。  
舊唐書卷四十七經籍志（臺北，鼎文書局印行，新校廿五史本），頁二〇二四。

各有脫亂，並同以意屬讀，得其端緒。因復是正文字疏證事辭，依採經書，爲之箋註。

此外，四部叢刊影印錢氏述古堂寫本與漢魏叢書本均無箋，世界書局印行者與四部備要本相同。

## (4) 王符的思想領域

王符在潛夫論中經常引用詩經和孔子的話，並常引書、易、傳等典籍，可知他不但深通詩經，對孔子十分崇敬，而且儒家的典籍，在他的思想中，也佔了最重要的地位。

此外，他又主張用法，重賞罰，其言論類似西漢的晁錯。因而汪繼培批評他說：「其學折中孔子，而復獵於申商刑名韓非子雜說，未爲醇儒」。<sup>27</sup> 有人認爲汪氏這話，雖然中肯，但不知韓非之法乃出於荀子之禮，禮從外作，而包括法令在內，所以只能說王符不是孟子之徒，若謂其非爲醇儒，似不知政治的道理。因視王符爲荀派儒學的掙扎者。<sup>28</sup> 其實這話也似不盡然，如謂荀子不談「天」，而專論「人」，然王符常言「天」，卽是很明顯的例子。

## 三、時代背景

如前所述，形成一個人的思想要素，除氣質、學問和遭遇外，卽是他所處的時代。王符生存的時代，是東漢的國運由盛而衰，百病萌生的大時代。原來東漢自章、和以後，由於網禁疏闊，豪族又乘勢將貪婪貨財、兼并土地、驕奢淫佚和無法無天的習性發作出來，使得帝國從此步入衰運，終於不可收拾。在這君子道消、小人道長的衰世，對王符的思想發生決定性的影響的，約有下列幾種顯著的病象，爲了正確明瞭他的思想內容，實有詳加敘述的必要。

(一) 豪族的驕奢與爲非作歹：明帝時，王侯貴戚之驕奢，卽屢見不鮮。<sup>29</sup> 章帝卽位，素知人，厭明帝苛切，事從寬厚，遂形成奢侈淫佚之風。如建初二年（七七）春三月詔曰：

今貴戚近親，奢縱無度，嫁娶送終，尤爲僭侈。<sup>30</sup>

其實例如帝舅馬防「兄弟貴盛，奴婢各千人已上，資產巨億，皆買京師膏腴美田，又大起第觀，連閣臨道，彌互街路，多聚聲樂，曲度比諸郊廟。賓客奔湊，四方畢至，京兆

<sup>27</sup> 同註一三。

<sup>28</sup> 薩孟武，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三篇第九節（一）（五十八年九月，臺北，三民書局印行），頁二一九。

<sup>29</sup> 後漢書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傳，頁一四四四。

<sup>30</sup> 同書卷三章帝紀，頁一三四。

杜篤之徒數百人，常爲食客，居門下。刺史、守、令多出其家。」<sup>31</sup>

又如光武子濟南安王康，於建初八年(八三)，「遂多殖財貨，大修宮室，奴婢至千四百人，廐馬千二百匹，私田八百頃，奢侈恣欲，游觀無節。」<sup>32</sup>

又如外戚竇憲，不但仗勢侵奪沁水公主的田園，<sup>33</sup>於和帝卽位後，因竇太后臨朝，執掌了大權，更明目張膽的作起惡來。竇憲與其兄弟(篤、景、瓌)，不但「競修第宅，窮極工匠」，而憲尤養了許多爪牙心腹，迫害異己，「刺史、守令多出其門。」連他的奴客都仗勢欺人，「強奪財貨，篡取罪人，妻略婦女。商賈閉塞，如避寇讎。有司畏懼，莫敢舉奏。」<sup>34</sup>由此可知，當時百姓的生命財產是毫無保障的。

和帝死後，至安帝初年，爲鄧太后攝政時期，時連年災荒，與羌禍併發，東漢至此已呈現出衰兆。幸賴太后及其兄弟鄧騭等的領導，「天下復平，歲還豐穰」。<sup>35</sup>太后崩後，安帝親政，外戚閻顯、耿寶、乳母王聖、宦官江京、李閭並用事。京、聖與中常侍樊豐等扇動內外，競爲侈虐。耿、閭更相阿黨，並用威權。當時以清廉著稱的太尉楊震，因一再拒絕他們的迫脅，又因屢上疏直諫，帝已不耐煩，他們遂合力譖殺震，使震做了黑暗政治下的犧牲者。

從順帝末年，到桓帝延熹二年(一五九)，是大將軍梁冀專政的時期。他仗着家中出過三個皇后，六個貴人的裙帶關係，兩個大將軍和七個侯爵的權勢，親手迎立了三個皇帝(冲帝、質帝和桓帝)，鳩殺了少而聰慧的質帝；枉害太尉李固、杜喬，濫殺無辜官吏，所在貪污受賄，霸佔人民貲財田地，「使人復乘勢橫暴，妻略婦女，毆擊吏卒，所在怨毒。冀乃大起第舍，而壽(冀妻)亦對街爲宅，殫極土木，互相誇競。堂寢皆有陰陽奧室，連房洞戶。柱壁雕鏤，加以銅漆；窗牖皆有綺疏青瑣，圖以雲氣仙靈。臺閣周通，更相臨望；飛梁石蹬，陵跨水道。金玉珠璣，異方珍怪，充積臧室。遠致汗血名馬。又廣開園囿，採土築山，十里九坂，以像二嶠，深林絕澗，有若自然，奇禽馴獸，飛走其間。冀壽共乘輦車，張羽蓋，飾以金銀，游觀第內，多從倡伎，鳴鍾吹管，酣謳竟路。或連繼日夜，以騁娛恣。客到門不得通，皆請謝門者，門者累千金。又多拓林苑，禁同王家，西至弘農，東界滎陽，南極魯陽，北達河、淇，包含山蔽，遠帶丘荒，周旋封域，殆將千里。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，經亙數十里，發屬縣卒徒，繕修樓觀，數年乃成。移檄所在，調發生菟，刻其毛以爲識，人有犯者，罪至刑死。嘗有西域賈胡，不知禁忌，誤殺一兔，轉相告言，坐死者十餘人。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，冀聞而捕

<sup>31</sup> 同書卷二十四馬防傳，頁八五九。

<sup>32</sup> 同註二九，頁一四三一。

<sup>33</sup> 後漢書卷二十三竇憲傳，頁八一二。

<sup>34</sup> 同上，頁八一八~八一九。

<sup>35</sup> 後漢書卷十上鄧皇后紀，頁四二五。

其賓客，一時殺三十餘人，無生還者。冀又起別第於城西，以納姦亡。或取良人，悉爲奴婢，至數千人，名曰『自賣人』。」<sup>36</sup> 由范曄這段描述看來，梁冀的居處與園囿建築，簡直成了人間仙境，更可惡的是人命反不如一兔值錢。范曄又接著描述他的目無法紀情況說：

元嘉元年，帝以冀有援立之功，欲崇殊典，乃大會公卿，共議其禮。於是有所奏冀入朝不趨，劔履上殿，謁讚不名，禮儀比蕭何；悉以定陶（陽）成（陽）餘戶增封爲四縣，比鄧禹；賞賜金錢、奴婢、綵帛、車馬、衣服、甲第，比霍光；以殊元勳。每朝會，與三公絕席。十日一入，平尚書事。宣布天下，爲萬世法。冀猶以所奏禮簿，意不悅。專擅威柄，凶恣日積，機事大小，莫不諮決之。宮衛近侍，並所親樹，禁省起居，纖微必知。百官遷召，皆先到冀門賤檄謝恩，然後敢詣尚書。……在位二十餘年，窮極滿盛，威行內外，百僚側目，莫敢違命，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。<sup>37</sup>

延熹二年（一五九），桓帝被他欺壓的再也無法忍受，乃與單超等五個宦官合謀，殺掉梁冀，政府抄賣他的家產，得錢達三十餘萬萬，「以充王府，用減天下稅租之半。」<sup>38</sup>

同年，單超等五人因功同日封侯，世謂之「五侯」。次年，單超病死，而「四侯轉橫。皆競起第宅，樓觀壯麗，窮極伎巧。金銀鬪毘，施於犬馬。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，皆珍飾華侈，擬則宮人。又養其疏屬，或乞嗣異姓，或買蒼頭爲子，並以傳國襲封。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，辜較百姓，與盜賊無異。」<sup>39</sup> 又宦者傳序說：

續以五侯合謀，梁冀受鉞，迹因公正，恩固主心，故中外服從，上下屏氣。或稱伊、霍之勳，無謝於往載；或謂良、平之畫，復興於當今。雖時有忠公，而意見排斥。舉動回山海，呼吸變霜露。阿旨曲求，則光寵三族；直情忤意，則參夷五宗。漢之綱紀大亂矣。

至於後來其他宦官殺人劫財、貪縱極奢的盜匪勾當，范曄描述的令人驚心動魄。<sup>40</sup> 在此不再贅述了。

總之，由上看來，東漢中葉以後的濁流豪族<sup>41</sup> 的胡作非爲，只顧個人的利害，不管

<sup>36</sup> 後漢書卷三十四梁冀傳，頁一一八一～一一八二。

<sup>37</sup> 同上，頁一一八三～一一八五。

<sup>38</sup> 同上，頁一一八七。

<sup>39</sup> 後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單超傳，頁二五二〇～二五二一。

<sup>40</sup> 參看宦者侯覽傳，頁二五二二～二五二三。

<sup>41</sup> 楊聯陞先生在東漢的豪族一文中，將東漢的豪族分成兩大類：一類是憑藉中央勢力而突然得意的，即宗室，外戚，與宦官。一類是自己漸漸發展起來的，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。前者稱爲濁流豪族，後者稱爲清流豪族（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四期，二十五年十月出版）。

百姓的死活，他們驕縱、兼并、專橫與亂法的結果，使得民怨沸騰，社會解體，帝國走向亂亡之路。

(二)選舉的腐化：關於東漢的選舉日益腐化的情況，詳見拙作**東漢的選舉**一文。<sup>42</sup>今略述如下：

東漢政權建立後，宗室、功臣與外戚即形成一特殊的豪族集團，他們假勢在經濟上侵漁百姓，在政治上把持選舉。所以，在光武帝時，就開始鬧選舉不實。<sup>43</sup>至章帝時，刺史、守相們以閹閹爲舉人的標準，已是普遍的現象。<sup>44</sup>和帝時，竇憲總攬大權，東漢的政治至此進入黑暗時期，選舉也顯著的腐化起來。如和帝誅憲後，永元五年（九五）三月詔曰：

二千石曾不承奉，恣心從好，司隸、刺史訖無糾察。……在位不以選舉爲憂，督察不以發覺爲負，非獨州郡也。是以庶官多非其人，下民被姦邪之傷，由法不行故也。<sup>45</sup>

順帝時，「署用非次，選舉乖宜，……刺史垂頭塞耳，阿私下比。」<sup>46</sup>

安帝親政後，因帝舅耿寶與皇后兄弟閹顯等的弄權，使得「祿去公室，政移私門」。<sup>47</sup>太尉楊震即因一再拒絕他們薦舉私人，又反對樊豐引用一些貪汙與失意的官吏，卒被他們共同陷害，前已述及。

順帝時，選舉不實的情形，更嚴重起來。使得官非其人，侵害人民，直接破壞了社會的安寧。在小人道長的情況下，公卿以下的官吏，類多拱默，以樹恩爲賢，盡節爲愚，互相勸戒說：「白璧不可爲，容容多後福。」<sup>48</sup>當時尚書令左雄奮力改善，雖暫時阻止住牧守不敢妄選，然總阻止不住權門的破壞，和富豪對當權者的銀彈攻勢。所以李固慨然道：「古之進者，有德有命；今之進者，唯財與力。」<sup>49</sup>

在梁冀專政時期，其殘暴縱恣的情形已如前述。在這「直如弦，死道邊；曲如鉤，反封侯。」<sup>50</sup>的黑暗時代，選舉制自然也遭受到梁氏及其黨徒的嚴重破壞。後冀被誅，單超等專權選舉，朝廷日亂。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說：

<sup>42</sup> 參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四期（臺北，六十六年五月出版），頁一三～三三。

<sup>43</sup> 參看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及後漢書卷二明帝紀，頁九八。

<sup>44</sup> 參看後漢書卷三章帝紀，頁一三二～一三三；卷二十六章彪傳，頁九一七～九一八。

<sup>45</sup>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注引，頁一七六。

<sup>46</sup> 同書同卷順帝紀，頁一九八。

<sup>47</sup> 後漢書卷四十八翟璜傳，頁一六〇三。

<sup>48</sup> 同書卷六十一左雄傳，頁二〇一五。

<sup>49</sup> 同書卷六十三李固傳，頁二〇七四。

<sup>50</sup> 同書卷七桓帝紀注引續漢志，頁二九一。

今官位錯亂，小人諂進，財貨公行，政化日損，尺一拜用不經御省。<sup>51</sup>結果，觸怒桓帝，被捕下獄。大鴻臚陳蕃上疏營救，也被免職回里。後雲等均死在獄中。太尉黃瓊自度力不能匡，乃稱疾不起。延熹七年（一六四），疾篤，上疏諫曰：

陛下卽位以來，未有勝政。諸梁秉權，豎官充朝，重封累職，傾動朝廷，卿校牧守之選，皆出其門，……言之者必族，附之者必榮。忠臣懼死而杜口，萬夫怖禍而木舌，……夫讒諛所舉，無高而不可升；〔阿黨〕相抑，無深而不可淪。可不察歟？書奏，不納。<sup>52</sup>

在這「賢愚渾殺，是非顛倒」的時代，富豪很容易買得官做；若無黨援，或家境貧寒，卽是賢才，也難有出頭之日。所以黃琬傳云：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，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。」

到桓、靈之際，政治已黑暗至極，選舉也腐化到達頂點。於是太學生與一些忠直的高官結合，與宦官集團展開了兩場大衝突，卽兩次的黨錮之禍。這已是王符暮年的事了。

(三)羌亂：自匈奴的主力被武帝擊破後，直到東漢，實際上中國並沒有嚴重的外患。然而，東漢於中葉以後，沒料想到遭受西羌的侵擾。此爲東漢整個建國形勢的弱點的暴露，以及應付的失策，並不在於西羌之難敵。<sup>53</sup>

羌人叛漢，始於和帝時。羌兵雖強不如匈奴，衆也不比鮮卑，然爲患甚於匈奴、鮮卑，是因爲他們移居塞內之緣故。胡漢雜居，由於風俗習慣不同，言語不通，本不易相處。加以東漢後期，政治腐敗，邊疆吏治的敗壞，地方官吏與豪族對羌人歧視虐待，毫無忌憚，乃激起他們的叛漢運動。起初，班彪上言光武請立護羌校尉時，就已指出這種矛盾現象。他說：

今涼州郡皆有降羌，羌胡被髮左衽，而與漢人雜處，習俗既異，言語不通，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，窮恚無聊，故致反叛。夫蠻夷寇亂，皆爲此也。<sup>54</sup>

自王莽末年以來，西羌之亂，經過明帝、章帝、和帝三代，屢次用兵，始完全平定。當時「諸降羌布在郡縣，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，積以愁怨。」<sup>55</sup>

安帝永初元年（一〇七）夏，徵調援西域，諸羌遂叛。當時，中原久無兵革，郡縣的常備兵又被光武帝廢去，諸羌久居郡縣，並無武器，「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，或負

<sup>51</sup> 同書卷五十七李雲傳，頁一八五二。

<sup>52</sup> 同書卷六十一黃琬傳，頁二〇四〇。

<sup>53</sup> 錢穆，國史大綱第十一章（民國五十三年十月，臺北，國立編譯館出版，商務印書館發行，臺八版），頁一五〇。

<sup>54</sup> 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，頁二八七八。

<sup>55</sup> 同上，頁二八八六。

板案以爲楯，或執銅鏡以象兵，郡縣畏懼不能制。」<sup>56</sup> 冬季，朝廷遣車騎將軍鄧騭，征西校尉任尙率領五萬人討伐，接連被打敗，羌聲勢大盛，「東犯趙、魏，南入益州，遂寇鈔三輔，斷隴道。隴中諸縣粟石萬錢，百姓死亡不可勝數。朝廷不能制，而轉運難劇。」<sup>57</sup> 鄧太后命龐參督三輔諸軍屯，詔騭回洛陽，升爲大將軍；留任尙屯漢陽，爲諸軍節度。

三年春，又派遣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。仁每戰不利。次年，以「軍營久出無功，有廢農桑，乃詔任尙將兵吏還屯長安。當時，鄧騭與公卿大臣，以國用不足，想採納龐參放棄涼州，內徙邊民的建議。郎中虞詡聞之，乃說太尉李膺道：

竊聞公卿定策當弃涼州，求之愚心，未見其便。先帝開拓土宇，劬勞後定，而今憚小費，舉而弃之。涼州既弃，卽以三輔爲塞；三輔爲塞，則園陵單外。此不可之甚者也。嗚呼！「關西出將，關東出相。」觀其習兵壯勇，實過餘州。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，爲心腹之害者，以涼州在後故也。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，無反顧之心者，爲臣屬於漢故也。若弃其境域，徙其人庶，安土重遷，必生異志。如使豪傑相聚衣猶有，席卷而東，雖賁、育爲卒，太公爲將，猶恐不足當禦。議者喻以補所完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。弃之非計。」膺曰：「吾意不及此。微子之言，幾敗國事。然則計當安出？」<sup>58</sup>

詡答道：今涼州擾動，人心惶惶不安，深恐將來發生非常的變故。「誠宜令四府九卿，各辟彼州數人，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，外以勸厲，答其功勤，內以拘致，防其邪計。」<sup>59</sup> 膺認爲他說的很對，又招集四府商討，皆從詡議。「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，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，以安慰之。」<sup>60</sup>

詡因與鄧騭意見不同，被斥做朝歌長。後遷懷令。當時，漢軍在前方屢戰屢敗，羌兵乘勝殺掠到河東、河內等郡，「二千石、令、長多內郡人，並無守戰意，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。朝廷從之。遂移隴西徙襄武，安定徙美陽，北地徙池陽，上郡徙衙。百姓戀土，不樂去舊，遂乃刈其禾稼，發徹室屋，夷營壁，破積聚。時連旱蝗飢荒，而驅蹙劫略，流離分散，隨道死亡，或弃捐老弱，或爲人僕妾，喪其大半」。<sup>61</sup> 關中與大河以北先後築塙壁，屯兵二十餘萬，抵禦羌兵。直到元初二年（一一五），中郎將任尙屯兵三輔，採納虞詡建議，改用騎兵。次年，度遼將軍鄧遵又用南匈奴騎兵擊羌，始屢戰屢

<sup>56</sup> 同上。

<sup>57</sup> 同上。

<sup>58</sup> 後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，頁一八六六。

<sup>59</sup> 同上。

<sup>60</sup> 同上。

<sup>61</sup> 同註五四，頁二八八七～二八八八。

勝。五年（一一八）、「諸羌瓦解，三輔、益州無復寇傲。」接連了十二年的戰爭，至此始告結束。計「軍旅之費，轉運委輸，用二百四十餘億，府帑空竭，延及內郡，邊民死者不可勝數，并、涼二州遂至虛耗。」<sup>62</sup>

此後，直到順帝永和四年（一三九），漢、羌仍繼續進行着小規模的戰爭。五年，羌亂再起，大寇三輔，殺害長吏。六年，征西將軍馬賢及其二子皆戰死，於是東西羌遂大合，進犯隴西，又燒園陵，掠關中。武威太守趙冲同羌兵奮力作戰，建康元年（一四四），不幸遇羌伏兵戰歿。冲雖身死，而前後多所斬獲，羌由是衰耗。至冲帝永嘉元年（一四五），採用恩信招誘辦法，羌人五萬餘戶投降。自永和羌亂，到這一年，「十餘年間，費用八十餘億。諸將多斷盜牢稟，私自潤入，皆以珍寶貨賂左右，上下放縱，不恤軍事，士卒不得其死者，白骨相望於野。」<sup>63</sup>

桓帝延熹二年（一五九），燒當羌八種侵擾隴右，被段熲擊破。四年，又犯并、涼及三輔，攻破營塢，情形危岌，朝廷用皇甫規為中郎將，擊破羌兵，羌人仰慕規的威信，相勸降十餘萬。明年，因東羌乞降，涼州復通。

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，屬國都尉李翕、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，涼州刺史郭閎、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，而皆倚恃權貴，不遵法度。規到州界，悉條奏其罪，或免或誅。羌人聞之，翕然反善，<sup>64</sup>又有十餘萬人來降，用費僅一億以上。皇甫規因此得罪了宦官和豪族，被下獄罰做勞役。

靈帝即位初年，段熲連破羌兵，東羌悉平，而東漢國運也衰了。所以范曄論曰：

羌戎之患，自三代尚矣。漢世方之匈奴，頗為衰寡，而中興以後，邊難漸大。朝規失綏御之和，戎帥驚然諾之信。其內屬者，或控惚於豪右之手，或屈折於奴僕之勤。塞侯時清，則憤怒而思禍；桴革暫動，則屬隄以鳥驚。故永初之間，羣種蜂起。遂解仇嫌，結盟詛，招引山豪，轉相嘯聚，揭木為兵，負柴為械。（穀）〔穀〕馬揚埃，陸梁於三輔；建號稱制，恣睢於北地。東犯趙、魏之郊，南入漢、蜀之鄙，塞邊中，斷隴道，燒陵園，剽城市，傷敗踵係，羽書日聞。并、涼之士，特衝殘斃，壯悍則委身於兵場，女婦則微纏而為虜，發冢露屍，死生塗炭。自西戎作逆，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。和熹以女君親政，威不外授。朝議憚兵力之捐，情存苟安。或以邊州難援，宜見捐弃；或懼疽食浸淫，莫知所限。謀夫回遑，猛士疑慮，遂徙西河四郡之人，雜寓關右之縣。發屋伐樹，塞其戀土之心；燔破賞積，以防顧還之思。於是諸將鄧騭、任尙、馬賢、皇甫規、張奐之徒……馳騁東西，奔救首

<sup>62</sup> 同註五四，頁二八九一。

<sup>63</sup> 同註五四，頁二八九七。

<sup>64</sup> 同註十，頁二一三三。

尾，搖動數州之境，日耗千金之資。至於假人增賦，借奉侯王，引金錢繅絲之珍，徵糧粟鹽鐵之積。所以賂遺購賞，轉輸勞來之費，前後數十巨萬。……故得不酬失，功不半勞。暴露師徒，連年而無所勝。官人屈竭，烈士憤喪。段熲受事，專掌軍任，資山西之猛性，練戎俗之態情，窮武思盡鬪銳以事之。……惜哉寇敵略定矣，而漢祚亦衰焉。<sup>65</sup>

以上所述，便是王符生存的時代，也是他著潛夫論的客觀形勢。

## 四、王符的政治思想

兩漢的知識分子所討論的問題，大致說來，在現實上是要解決大一統地專制下的政治問題，在其理念上是要解決天人性命的問題<sup>66</sup>。王符在潛夫論中所表露的思想，也分作這兩部分，一是政治思想，二是哲學思想。在此，先討論他的政治思想中的一部分，其他容另文介紹。

### (1) 民本主義

我國政治思想上的民本觀念，淵源甚古。在尚書、左傳、論語和孟子中，這種理論，屢見不鮮。王符承襲了這種傳統思想，所以，對當時黑暗政治嚴厲的指責，對驕縱跋扈與亂法的權貴豪族無情的攻擊，對奢淫之風猛烈的批評，對邊政問題痛切的陳詞，無不以民本觀念作立論的基礎。

王符目擊當時外戚宦官等豪族的爲非做歹，只顧本身的利益，不管百姓的死活，都像餓虎飢狼似的，張牙舞爪，肆意噬食百姓，人民的生命財產完全失去保障。因此，在邊利、本政、忠賢、班祿、述赦、愛日與救邊等篇中，反覆強調人民是國家的根本，皇天以人民爲主，凡使人民安樂的，便是順從天意，國家就會太平；否則，便會招致敗亡。在此將他有關這方面的言論簡錄於下，以便參考。

（甲）「帝以天爲制，天以民爲心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是故無功庸於民，而求盈者，未嘗不力（立）顛也。有勲德於民，而謙損者，未嘗不光榮也。」<sup>67</sup>

（乙）「天以民爲心，民安樂，則天心順；民愁苦，則天心逆。民以君爲統，君政善，則民和治；君政惡，則民冤亂。君以恤民爲本……民安樂，則天心慰；天心慰，則陰陽和；陰陽和，則五穀豐；五穀豐，而民眉壽；民眉壽，則興於義；興於義，而無姦行；無姦行，則世平而國家寧，社稷安而君尊榮矣。」<sup>68</sup>

<sup>65</sup> 同註五四，頁二八九九～二九〇一。

<sup>66</sup> 徐復觀，兩漢思想史，頁六一〇。

<sup>67</sup> 潛夫論卷一邊利第三，頁十二。

<sup>68</sup> 同書卷二本政第九，頁十六～十七。

(丙)「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，天之所愛育者民也。今人臣受君之重位，牧天之所甚愛，焉可以不安而利之，養而濟之哉？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，……五代之臣，以道事君，以仁撫世，澤及草木，兼利外內，普天率土，莫不被德，……是以福祚流衍，本枝百世。季世之臣，不思順天，而時主是諛。謂破敵者為忠，多殺者為賢。白起、蒙恬，秦以為功，天以為賊；息夫、董賢，主以為忠，天以為盜。此等之儔，雖見貴於時君，然上不順天心，下不得民意，故卒泣號咷，以辱終也。……歷觀前世貴人，……殭屍破家，覆宗滅族者，皆無功於民氓者也。當呂氏（呂祿、呂產）……霍氏（霍禹、山、雲）……王氏（莽）……卒其敗者，……常……虐百姓，而失民心爾。」<sup>69</sup>

(丁)「天之立君，非私此人也以役民，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。……吏愛官而不貪，民安靜而強力，此則太平之基立矣。」<sup>70</sup>

(戊)「為國者，必先知民之所苦，……蓋民惟國之基也。」<sup>71</sup>

(己)「國之所以為國者，以有民也。……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可無思哉？可無思哉？」<sup>72</sup>

(庚)「聖王之政，普覆兼愛，不私近密，不忽疏遠，吉凶禍福，與民共之。哀樂之情，恕以及人，視民如赤子，救禍如引手爛，是以四海歡悅，俱相得用。」<sup>73</sup>

(辛)「國以民為基，貴以賤為本，願察開闢以來，民危而國安者誰也？下貧而上富者誰也？」<sup>74</sup>

民本觀念既是他論政的主幹。所以，他將為民興利除害之大業寄望於聖君身上。他說：

太古之時，烝黎初載，未有上下而自順序。天未事焉，君未設焉。後稍矯虔，或相陵虐，侵漁不止，為萌巨害。於是天命聖人，使牧司之，使不失性。四海蒙利，莫不被德，僉共奉戴，謂之天子。故天之立君，……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。<sup>75</sup>但明君不能獨治天下，必須有賢臣輔佐，才能造福人羣。所以，他再三強調用賢的重要。這就是他的尚賢論之由來。

## (2)尚賢論

在君主專制政體下，全國的官吏都只對天子一人負責。因此，國家的治亂存亡全繫

<sup>69</sup> 同書卷三忠實第十一，頁二～六。

<sup>70</sup> 同書卷四班祿第十五，頁一～三。

<sup>71</sup> 同書卷四述教第十六，頁六～八。

<sup>72</sup> 同書卷四愛日第十八，頁二四～三〇。

<sup>73</sup> 同書卷五救邊第二十二，頁十六。

<sup>74</sup> 同書卷五邊職第二十三，頁二五。

<sup>75</sup> 同註七〇，頁一。

君主的明闇。人君能兼聽則明，偏信則闇。王符說：

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，其所以亂者君闇也。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，其所以闇者偏信也。是故人君通必兼聽，則聖日廣矣。庸說偏信，則愚日甚矣……夫堯舜之治，闢四門，明四目，通四聰，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照。故共鯀之徒，弗能塞也。靖言庸回，弗能惑也。秦之二世，務隱藏己而斷百僚，隔捐疏賤而信趙高，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，明蔽於驕妒之人，故天下潰叛，弗得聞也……故人君兼聽納下，則貴臣不得誣，而遠人不得欺也。慢賤信貴，則朝廷讜言無以至，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。<sup>76</sup>

所以，明君蒞衆，「務下言以昭外敬，納卑賤以誘賢」<sup>77</sup>，「聖王表小以厲大，賞鄙以招賢，然後良士集於朝，下情達於君。」<sup>78</sup>

他在思賢篇中說明，人不想進食，是將生病的症候，國不任賢，是將亂的原因。病人家中，並非沒有嘉餚，只因病人不能吃，遂致死亡。亂國的官吏，並非沒有賢人，只因人君不信任，乃至滅亡。治國同理身的道理相似。人病了，須請良醫診治，才能痊癒。國亂了，須任賢能，方可平治。

一國的治亂，既和能任賢與否有很大的關係。但那種人纔是賢臣呢？他在著嘆篇中有很確切的說明。

夫賢者之爲人臣，不損君以奉佞，不阿衆以取容，不墮公以聽私，不撓法以吐剛，其明能照姦，而義不比黨。

他又認爲賢人「只在志行」，沒有富貴貧賤和親疏遠近的分別。在論榮、本政等篇中，他一再強調這一點：

賢愚在心，不在貴賤，信欺在性，不在親疎。<sup>79</sup>

所謂賢人君子者，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。此則君子之所宜有，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。所謂小人者，非必貧賤凍餒辱窮之謂也。此則小人之所宜處，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……論士苟定於志行，……故君子未必富貴，小人未必貧賤。<sup>80</sup>

王符目睹當時已發生「以族舉德，以位命賢」<sup>81</sup>的流弊，一般人，「虛談則知以德

<sup>76</sup> 潛夫論卷二明闇第六，頁一～二。

<sup>77</sup> 同上，頁二。

<sup>78</sup> 同上。

<sup>79</sup> 同註六八，頁十八。

<sup>80</sup> 潛夫論卷一論榮第四，頁十五～十六。

<sup>81</sup> 同上，頁十六。

義爲賢，貢薦則必閎闕爲前」<sup>82</sup>。所以，他力斥這種弊俗道：

夫世人之善惡，不必世族。性之賢鄙，不必世俗。中堂生負苞，山野生蘭芷。夫和氏之璧，出於璞石，隋氏之珠，產於曆蛤……苟有大美可尚於世，則雖細行小瑕，曷足以爲累乎？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，而患其非忠；世非患無臣，而患其非賢。蓋無鞮蹠，陳平、韓信，楚俘也，而高祖以爲藩輔，實平四海安漢室。衛青、霍去病，平陽之私人也，而武帝以爲司馬，實攘北狄、郡河西。惟其任也，何卑遠之有？然則所難於非此土之人，非將相之世者，爲其無是能而處是位，無是德而居是貴；無以我尚，而不秉我勢也。<sup>83</sup>

國人的性格和作風，確有許多優點，但也有缺點，最大的缺點，莫過於妒賢嫉能。這不僅是我國自古以來亂多治少的主要原因，也是東漢國運由盛而衰的癥結所在。有國之君，未嘗不願平治，但爲什麼又不能治呢？王符對這個問題，作了進一步的分析。他認爲完全是賢人被權貴妒嫉，不得任用造成的。他說：

世之所以不治者，由賢難也。所謂賢難者，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，此則求賢之難得爾，非賢者之所難也。故所謂賢難者，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，行賢則見嫉，而必遇患難者也。虞舜之所以放殛，子胥之所以被誅；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，則又況乎中世之人哉！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，然猶不得直道而行，遂成其志者也。處士不得直其行，朝臣不得直其言；此俗化之所以敗，闔君之所以孤也。……詩云：「無罪無辜，讒口敖敖；彼人之心，于何不臻。」由此觀之，妒媚之攻擊也，亦誠工矣，賢聖之居世也，亦誠危矣。故所謂賢難也者，非賢難也，免則難也……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……今世主之於士也，目見賢則不敢用，耳聞賢則恨不及……夫衆小朋黨而固位，讒妒羣吠，齧賢爲禍敗也豈希。三代之以覆，列國之以滅，後人猶不能革，此萬官所以屢失守，而天命數靡常者也……嗚呼！時君俗主，不此察也。<sup>84</sup>

又說：

凡有國之君，未嘗不欲治也。而治不世見者，所任不賢故也。世未嘗無賢也，而賢不得用者，羣臣妒也。主有素賢之心，而無得賢之術。臣有進賢之名，而無進賢之實。此以人君孤危於上，而道獨抑於下也。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，公也。公法行則軌亂絕。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。私術用則公法奪。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，正節立則醜類代。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，所以日夜杜塞賢臣義士之間，威使不相得

<sup>82</sup> 潘夫論卷八交際第三十，頁十一。

<sup>83</sup> 同註八〇，頁十七～十八。

<sup>84</sup> 潘夫論卷一賢難第五，頁十八～二四。

者也……正義之士，與邪枉之人不兩立。而人君之取士也，不能參聽民氓，斷之聰明，反徒信亂臣之說，獨用汚吏之言，此所謂與仇選使，令囚擇吏者也……孔子曰：「衆好之，必察焉。衆惡之，必察焉。」故聖人之施舍也，不必任衆，亦不必專己。必察彼己之爲，而度之以義。或舍人取己，故舉無遺失，而政無廢滅也。惑君則不然，己有所愛，則因以斷正。不稽於衆，不謀於心，苟眩於愛，惟言是從，此政所以敗亂，而士所以放佚者也……末世……徒信貴人驕妒之議，獨用苟媚壘惑之言，行豐禮者蒙僇咎，論德議者見尤惡。於是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，被以議上之刑，此賢士之始困也。夫詆訾之法者，伐賢之斧也，而驕妒者，噬賢之狗也。人君內秉伐賢之斧，權噬賢之狗，而外招賢，欲其至也，不亦悲乎！<sup>85</sup>

又說：

當塗之人，恒嫉正直之士……凡驕臣之好隱賢也，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，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，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。是以鄒宛得衆，而子常殺之；屈原得君，而椒蘭構讒；耿壽建常平，而嚴延妒其謀；陳湯殺鄧支，而匡衡拔其功。由此觀之，處位卑賤，而欲效善於君，則必先與寵爲讎矣。<sup>86</sup>

這不但說明了楊震、李固、杜喬等忠直之士被殺，和其他賢臣被廢錮的原因，同時也揭發了外戚宦官殘害忠良，禍國殃民的罪行。因此，他對當時的權貴痛加攻擊說：

今世得位之徒，依女妹之寵以驕士，藉亢龍之勢以陵賢，欲使志義之士，匍匐曲躬以事己，毀顏諂諛以求親。<sup>87</sup>

自春秋之後，戰國之制，將相權臣必以親家，皇后兄弟主壻外孫，年雖童妙，未脫桎梏，由藉此官職，功不加民，澤不被下，而取侯多受茅土，又不得治民效能，以報百姓，虛食重祿，素餐尸位，而但事淫侈，坐作驕奢……世主之於貴戚也……不量其材而授之官……令結怨於下民……欲無功之人而疆富之，則是與天鬪也。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鬪，而欲久之。自古以來，未之嘗有也。<sup>88</sup>

由此觀之，衰世羣臣誠少賢也。其官益大者罪益重，位益高者罪益深爾。故曰，治世之德，衰世之惡，常與爵位自相副也。<sup>89</sup>

當時，權貴之所以驕縱跋扈，嫉賢害能，爲非作歹，人君不能辭其咎。所以，他大膽的指皇帝把高官厚祿授給這些無德無功之徒，實爲盜天的大賊。

……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。天之制此財也，猶國君之有府庫也。賦賞奪與各

<sup>85</sup> 同書卷二潛漢第十，頁二一二五。

<sup>86</sup> 同書卷二明闇第六，頁二一～四。

<sup>87</sup> 同註六八，頁二〇。

<sup>88</sup> 同書卷二思賢第八，頁十四～十六。

<sup>89</sup> 同註六八，頁十九。

有衆寡，民豈得強取多哉！故人有無德而富貴，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。終必覺，覺必誅矣。盜人必誅，況乃盜天乎？得無受禍焉……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，諸侯不能違帝厚私歡。<sup>90</sup>

在這天子盡私其寵倖，不能任賢的情況下，使得有漢以來賢者在位、能者在職的官僚政治也日益腐化起來。王符很憤慨的批評當時選舉腐化的情況說：

國以賢興，以諂衰……十步之間，必有茂草；十室之邑，必有俊士。賢材之生，日月相屬，未嘗乏絕……以漢之廣博，士民之衆多，朝廷之清明，上下之修治，而官無直吏，位無良臣。此非今世之無賢也，乃賢者廢錮，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。夫志道者少友，逐俗者多儔。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，競比質而行趨華，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，準其材行也。直虛造空美，掃地洞說，擇能者而書之，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，歷察其狀，德侔顏淵、卜丹，最其行能，多不及中。誠使皆如狀文，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……太平之世，而云無士，數開橫選，而不得真，甚可憤也。<sup>91</sup>

由此可知，當時的選舉貢士，在朋黨用私下，不再以才幹志行作標準，都是虛造聲譽，形成僞舉。

羣僚舉士者，或以頑魯應茂才，以桀逆應至孝，以貪婪應廉吏，以狡猾應方正，以諛諂應直言，以輕薄應敦厚，以空虛應有道，以鬻鬪應明經，以殘酷應寬博，以怯弱應武猛，以愚頑應治劇。名實不相副，求貢不相稱。富者乘其材力，貴者阻其勢要。以錢多爲賢，以剛強爲上。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，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。<sup>92</sup>

再者，照上面莫來，東漢一歲得大賢二百，百歲卽得兩萬。國家有了幾萬大賢，按理應大有作爲的，但他們平時卽不思立功，「貪殘專恣，不奉法令，侵冤小民」，<sup>93</sup> 亂時恐怕更經不起考驗了。例如西漢末年，大小聖賢官吏十萬人，當王莽篡位時，能奉國報恩的，只有劉崇、翟義二人，卽是最明顯的例子。因此，王符認爲要阻止官僚政治的腐化，必先從明選着手。他說：

君以恤民爲本，（政治）以選爲本，選舉實則忠賢進，選虛僞則邪黨貢，選以法令爲本，法令正則選舉實，法令詐則選虛僞。法以君爲主，君信法則法順行，君欺法則法委棄……將致太平者，必先安其人，安其人者，必先審擇其人。是故國家

<sup>90</sup> 同註六七，頁十二。

<sup>91</sup> 潛夫論卷三實貢第十四，頁二二～二五。

<sup>92</sup> 同書卷二考績第七，頁八。

<sup>93</sup> 同上，頁七。

存亡之本，治亂之機，在於明選而已矣。<sup>94</sup>

其次，便是重賞罰。因為一個人有了權力，如無約束，容易腐敗。尤其牧守，職高權大，苟非其人，百姓必深受其殃。漢宣帝深明此理，乃明選守相，嚴行賞罰，以至國泰民安。據王符觀察，當時的刺史、守相，大都怠忽職守，專務私利，不理民事。他認為牧守大臣乃國家盛衰的本原，不可不選練；法令賞罰，實治亂的樞機，應嚴格實行。要移風易俗，使羣臣都兢兢業業，努力公務，非加重賞罰不可。

今……有功不賞，無德不削，甚非勸善懲惡，誘進忠賢，移風易俗之法術也……今之守相，制地千里，威權勢力，盛於列侯，材明德義，未必過古，而所治逾百里，此以所治多荒亂也。是故守相不可不審也。昔宣皇帝與於民間，深知之，故常嘆曰：「萬民所以安，田里無憂患者，政平訟治也。與我共此者，其惟良二千石。於是明選守相，其初除者，必躬見之，觀其志趣，以昭其能，明察其治，重其刑賞，姦宄減少，戶口增息者，賞賜金帛，爵至封侯；其耗亂無狀者，皆銜刀瀝血於市，賞重而信，罰痛而必。羣臣畏勸，競思其職，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……由此觀之，牧守大臣者，誠盛衰之本原也，不可不選練也。法令賞罰者，誠治亂之樞機也，不可不嚴行也……今者刺史守相，率多怠慢，違背法律，廢忽詔令，專情務利，不郵公事，細民冤結，無所控告……此皆太寬之所致也……夫積怠之俗，賞不隆則善不勸，罰不重則惡不懲，故凡欲變風改俗者，其行賞罰者也，必使足驚心破膽，民乃易視。聖主誠肯明察，羣臣竭精稱職，有功效者，無愛金帛封侯之費，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，圖鐵鑕之決。然則良臣如王成、黃霸、龔遂、邵信臣之徒，可比郡而得也，神明瑞應可暮年而致也。<sup>95</sup>

複次，便是豐俸祿。管子說：「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。」王符認為要阻止官吏的禍國殃民，除重賞罰外，必先豐其俸祿，使其豐衣足食，競尚廉恥，人民始得安靜向善。如此，方能導致太平。

……先聖……其班祿也……在官者祿足以代耕……官政專公，不慮私家；子弟事學，不干財利，閉門自守，不與民交利，而無飢寒之道……臣養優而不隘，吏愛官而不貪，民安靜而強力，此則太平之基立矣……是故明君臨衆，必以正軌，既無厭有務，節禮而厚下，復德而崇化，使皆阜於養生，而競於廉恥也。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，邪心黜而姦匪絕，然後乃能協和氣，而致太平也。<sup>96</sup>

又其次，便是行考績。為君之難，難於辨別真偽。真偽莫辨，則忠賢失勢，讒邪得

<sup>94</sup> 同註六八，頁十七～十八。

<sup>95</sup> 潛夫論卷四三式第十七，頁二二～二四。

<sup>96</sup> 同註七〇，頁二～五。

志，政治沒有不腐敗，國家沒有不亂的。明君應有犀利的眼光，考覈人才的賢愚真偽，不被讒媚與害民者所蒙蔽，使竭慮奉公、勤政愛民者能够升進。這樣，才能使得國治民安。王符認為君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，就像欲捨棄規矩而為方圓，沒有舟楫而想渡過大水一樣的艱難。因而主張實行考績，以補救當時選舉腐化之流弊。他說：

凡南面之大務，莫急於知賢；知賢之近途，莫急於考功。功誠考，則治亂暴而明；善惡信，則直（真）賢不得見障蔽，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。夫劍不試則利鈍闕，弓不試則勁撓誣，鷹不試則巧拙惑，馬不試則良駑疑。此四者之有相紛也，由不考試故得然也。今羣臣之不試也，其禍非直止於誣闕疑惑而已，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。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，父母不察精悞，則勸力者懈弛，而惰慢者遂非也，耗業破家之道也。父子兄弟一門之計，猶有若此，則又況乎羣臣總狼治公事者哉！傳曰：「善惡無彰，何以沮勸。」是故大人不考功，則子孫惰而家破窮；官長不考功，則吏怠傲而姦宄興；帝王不考功，則直（真）賢疑而詐偽勝。故書曰：「三載考績，黜陟幽明。」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。<sup>97</sup>

最後一點，是主力學。人不學，不知義。荀子說：「木受繩則直，金就礪則利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」<sup>98</sup> 東漢中葉以後，學風日益廢弛。後漢書卷七十九儒林傳序描述當時的情況說：

及鄧后稱制，學者頗懈……儒職多非其人……自安帝覽政，薄於藝文，博士倚席不講，朋徒相視怠散，學舍隳敝，鞠為園蔬，牧兒堯豎，至於薪刈其下。順帝感翟酺之言，乃更脩黌宇……自是遊學增盛，至三萬餘生。然章句漸疏，而多以浮華相尚，儒者之風蓋衰矣。

王符有鑒於此，認為要維持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」的官僚政治，除積極的明選舉、重賞罰、行考績外，基本的辦法應從改善學風，與培養賢能着手。所以，他在潛夫論中首先論為學的重要說：

天地之所貴者人也，聖人之所尚者義也；德義之所成者智也；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……夫此十一君者，皆上聖也，猶待學問，其智乃博，其德乃碩，而況於凡人乎？是故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；士欲宣其義，必先讀其書。易曰：「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」……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，非直為博己而已也，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，而以顯父母也。孔子曰：「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無益，不如學也。耕也，餒在其中；學也，祿在其中矣！君子憂道，不憂貧。」……董仲舒……景君明（京房）……倪寬……匡衡……夫此四子者，耳目聰明，忠信廉

<sup>97</sup> 同註九二，頁四～六。

<sup>98</sup> 荀子第一篇勸學（梁啟雄，荀子集解，六十三年十二月，臺北，河洛圖書出版社出版），頁一。

勇，未必無壽也；而及其成名立績，德音令聞不已，而有所以然，夫何故哉？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，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……是故索物於夜空者，莫良於火，索道於當世者，莫良於典。典者，經也，先聖之所制。先聖得道之精者，以行其身，欲賢人自勉，以入於道。故聖人之制經，以遺後賢也……是故凡欲顯勳績，揚光烈者，莫良於學矣。<sup>99</sup>

如上所述，一個人受了良好的教育，一旦步入仕途，就會奉公守法，造福人羣了。

## 五、小 結

綜上所述，可知王符生逢「小人貴寵，君子困賤；姦人擅無窮之福利，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」<sup>100</sup>的衰世，目擊政治日益腐敗，萬民塗炭，深嘆自己無力拯救百姓，造福人羣，乃不顧個人之生死榮辱，發憤著述，評論時政，希望透過文字，影響執政，間接嘉惠人民。因此，他對當時弊政一切的批評，都從「民為邦本」出發，最後又都歸結於「本固邦寧」上。這種民本主義的論調，在潛夫論中，到處可見。所以，此書實堪稱為民請命的血書，它明顯的揭示出一代大儒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的偉大抱負。他這種言論，或有人認為陳腐浮淺，然縱觀歷代治亂興衰的原因，確為歷久彌新的議論。

為了百姓的福祉，自古以來，我國學者無不寄望於聖君明王的出而領導。王符也是如此。然上雖有明君，下若無賢臣，也不能獨治天下。所以，他再三闡述用賢的重要。他在賢難、思賢、本政、潛嘆與賈實等篇中，反覆的說明一國的治亂興衰，同任賢與否有極密切的關係。正如清人唐甄所言：

為政之務甚多，唯用賢為國之大事。治亂必於斯，興亡必於斯，他更無所於由也，一於斯而已矣。<sup>101</sup>

然真賢難求，唐氏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是：

求賢之道，勿問孰為賢，孰為不肖，當先觀進賢之人。蓋賢不肖各有其類……從伯夷遊者，必伯夷之所與也，無盜跖之徒也；從盜跖遊者，必盜跖之所與也，無伯夷之徒也。若使盜跖主進，而望其所進之人有若伯夷者，豈可得哉！是故明君察於羣臣之中，得其大賢，處以上卿之位，惟其言之是聽，而不惑於讒慝之口，則列於朝廷者皆其類矣。列於朝廷者皆其類，則列於邦國之職者亦皆其類。各以類進，則賢才不可勝用矣。

<sup>99</sup> 潛夫論卷一讀學第一，頁一～六。

<sup>100</sup> 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，頁一六四九。

<sup>101</sup> 潛書下篇上主進（六十三年三月，臺北，河洛圖書出版社），頁一五一。

……惟賢者乃能進賢，得賢者為進賢之人，使各舉所知，所以引其類也。惟知賢者乃能用賢，得知賢者為用賢之人，使擇決眾之所舉，所以用其長也。具斯二者，用賢之道無遺矣。<sup>102</sup>

唐氏這種見解無異是受王符的影響。王氏鑒於「今當塗之人，既不能昭練賢鄙，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，脅以權勢之屬託，請謁闖門，禮贊輻輳，迫於目前之急，則且先之。此正士之所獨蔽，而羣邪之所黨進也。周公之為宰輔也，以謙下士，故能得真賢，祁奚之為大夫也，舉讎薦子，故能得正人」<sup>103</sup>。因此，他認為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同明相見，同聽相聞，惟聖知聖，惟賢知賢」<sup>104</sup>。實際上，由於當時外戚宦官先後把持政權，使得選舉已濫，官非其人，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。如仲長統描述道：

……權移外戚之家，寵被近習之豎，親其黨類，用其私人，內充京師，外布列郡，顛倒賢愚，貿易選舉，疲驚守境，貪殘牧民，撓擾百姓，忿怒四夷，招致乖叛，亂離斯瘼。怨氣並作，陰陽失和，三光虧缺，怪異數至，蟲螟食稼，水旱為災，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。<sup>105</sup>

他面對着這些極複雜的社會問題，認為只要阻止住官僚政治的不再腐化，再使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」，一切問題就容易解決了。所以，他一再批評濫選，強調明選舉、厚俸祿與行考績等的重要。他雖然看到了問題的癥結，但在閹君佞臣的把持下，一切積弊已深，並沒有產生什麼作用。不過，他的思想對後世却發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至於，他的務本、遏利、斥奢、反赦的言論，和對邊政問題的主張，以及天道天命觀等哲學思想，都是他的卓識深思，蘊積於中，發為文辭的結晶，這些問題，將另文介紹了。

本論文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研究完成。

<sup>102</sup> 同上，頁一五二～一五三。

<sup>103</sup> 同註六八，頁十九～二〇。

<sup>104</sup> 同上，頁十九。

<sup>105</sup> 同註一〇〇，頁一六五七。